

中國諺語集成湖南卷

湘潭市分卷

中国谚语集成湖南卷
湘潭市分卷

湘潭市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月

中国谚语集成湖南卷
湘潭市分卷

开本：大32开本(850×1156毫米)字数：20万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0001—1000

湘潭市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

湘潭市彩印厂印装

内部发行

中国民间文艺三套集成

湖南卷湘潭分卷序

湘潭市集成办

湘潭地处湘江中游，上连衡岳，下接洞庭，是一个水陆交通枢纽，又是一个富饶的鱼米之乡，她有“小南京”之荣称，以及“金湘潭、银益阳”之盛誉。晋陶桓公侃督潭州时，卜居石嘴脑旁，留下了陶公山、陶公钓鱼台、陶公墓等史迹；宋刘太尉铸被贬知潭州时，筑宅昭山脚下，他的抗金大节和“三千里地无知己，十万军中挂印来”的悲歌，至今犹为人们所传诵。近代的秋瑾烈士，婆家住在由义巷里，就义后曾暂厝侠骨于昭山；黄兴将军和刘道一、马福益等民主革命先驱，曾在谭家山筹划起义，由长、潭、平、浏而及全省，黄将军的两位太夫人墓葬昭麓，与湘潭城内的刘烈士祠互相辉映。现代的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元帅、黄公略、陈赓等，也就是这块丰腴的土地所养育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至于岸花亭下，杜老的名句沁人心脾；唐兴寺前，褚公的墨宝鼓人正气；明包鸿逵的高峰塔，显示了一代风流；清王闿运的湘绮楼，留传下千秋佳话。现代的黎氏兄弟，白石艺风，则更是名重全球，声靡海外了。地灵出人杰，人杰促地灵，这个辩证规律，便可从湘潭这一隅之地得到充分的证明。

民间文学哺育作家文学，作家文学又回过头来影响着民间文学，这个关系也是辩证的。前面谈到的这些古今英雄人物和文艺大师，他们的业迹文名，彪炳史册。属于古楚国内地的湘潭，本应该是浪漫主义的神话之乡，可是，除少数土生土长的《仙女山婆媳飞升》、《云湖桥龙蛟斗力》等传说略带神话色彩之外，更多的民间故事却是些历史人物传说，地方风物传说，机智人物故事，文人诗对故事以及新类型的革命人物传说，革命机智人物故事等现实主义作品。湘潭又是古代的“蛮方”，她本身既是“长沙蛮”的一部分，又是“武陵蛮”、“梅山蛮”等的近邻，民间文学作品里保存了很多古楚民族的原始文化遗留物，虽然经历过封建统治阶级的多次屠杀洗劫和自然的民族迁徙，但这些原始文化的残迹，却根深蒂固地浸渍着人们的心灵。因此，在湘潭的民歌里，表现出一种顽强的天人平等、物我平等的民神杂糅观念，这种观念随着社会的进步，贯串在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到“无湘不成军”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形成了湘潭人的不怕天，不信邪”和“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的民风民俗。正由于湘潭的地理环境是交通枢纽和鱼米之乡，正由于湘潭经历过历史劫难和大量移民，以至历史上曾有由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等地商民所建的北五省会馆，由江苏商民所建的金庭、江南、苏州、雨花四个会馆，由江西商民所建的豫章、临丰、石阳、昭武等一十三个会馆，并有由福建、广东、广西、湖北等省商民所建的七帮会馆。此外，本省的永州、郴州、衡州商民也在湘潭建有会馆。这些外省、外州（地区）的移民们，不但将他们的生产技能、经营知识等丰富了湘潭人民的物质生活，无疑地也会将他们各自的文化艺术带到湘潭，起着互相渗透，水乳交融的作用。因

此，象《许旌阳斩孽龙》的民间故事，既具有湘潭的地方色彩，也洋溢着江西人民的乡土感情。因为，许旌阳是江西人，江西的万寿宫里就祀奉着他的神象，他所斩的孽龙是从江西追到湘潭昭山底下来的。所以，孽龙的妻子，必然地会被囚入“头在江西铁树观，尾在湘潭碧泉潭”的阴河里了。再看，本来应该是产生在杭州的白蛇传说，它却在湘潭挽歌里出现，成了一首具有湘潭特色的长篇叙事歌谣；烧宝塔这一民俗活动和民间传说，解放前曾为湘潭所特有。据说还是元末明初产生的《烧宝塔歌》，解放前还在儿童们口中流传，这些不能说不是由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渗入的文化交流现象。这一现象，特别表现在湘潭谚语里，由于各地移民都有其独特经营的行业，如江苏的绸布业、江西的药材业、福建的丝烟业等。因此，湘潭谚语中不仅有具地方特色的“土产”，也有很多“全国通用粮票”，其中的行业谚语，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自许为这次集成工作中的一个具有特色的学术成果。

当然，湘潭的民间文学作品蕴藏量浩如烟海，我们的工作限于财力、物力和人力，特别是限于工作人员的学术水平，同时又在“文化革命”之后，只能从沧海遗珠中掬取到这么一串串，难免遗漏与讹误，只好留待将来补充、订正，同时亟望海内外同行不吝指教。

（执笔者：阳 光 唐 愍）

序

彭 燕 郊

由湘潭市三套集成领导小组委托陈旸同志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谚语集成湖南卷湘潭市分卷》(以下简称“分卷”),给我带来如此强烈和持久的喜悦,“分卷”内容的丰富,编选的精到给了我多方面的启示,我不禁要怀着感激之情写出我的读后感。

“分卷”给我的主要启示是我们对民间文学必须不断进行观念的更新,在搜集整理工作上是这样,在研究工作上也应当这样。民间文学这一学科在我国还很年轻,年轻有很大的优越性,就是善于吸收,勇于改变和纠正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或不完全正确的观念。对于谚语,尽管没有人明确指出它在民间文学各种门类中是最“贫乏”或比较“贫乏”的,但从许多作者谈论到它时引用的总是那些不知被引用过多少次的,往往属于所谓为人处世、人情世故一类,其实并不能代表谚语的特点的现成例子,可以想见论者们眼中的谚语是贫乏到何等程度了。如果我们稍为认真一点,把搜集工作做得稍为深入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谚语或许可以说是民间文学中涉及面最广,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种。“分卷”告诉我们,必须改变那种“浅尝辄止”的习惯,对谚语和民间文学的所有门类的作品,绝不能满足于一孔之见。瞎子摸象这个笑话,我在幼年时就听说过了,使我对这个笑话保有新鲜印

象的原因是自己不免常常是个瞎子，是在摸象。这部“分卷”当然还不就是一只谚语大象，但可以说是粗具规模了。请看看，这里面有多少出人意料的新资料！我们确实有足够的根据说：生活里有什么，就有关于它的谚语。很可能由于篇幅限制，“分卷”还没有把搜集到的某些内容的谚语都收录进来，但现有的规模已能说明我们如果不更新对谚语的观念，老是停留在已有的资料上，将会给我们的工作和研究造成多大的损失了。同时，湘潭的同志们也以他们的工作成果告诉我们，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正是因为他们对谚语搜集工作有着准确的估计和永不衰竭的热情，和不畏辛苦的工作态度。

“分卷”给我的又一个启示是我们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上，不畏辛苦的工作态度，必须体现在工作中不断寻求新的工作方法上，谚语的搜集远比民间故事、民歌困难，它是深藏在语言海洋里的珍珠，谁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人的嘴巴上闪现一下光芒。一般说我们只能采用一听到就记下这个办法，但这却未免太“手工业化”了。陈旸同志告诉我，湘潭的同志们为了搜集行业谚语（他们注意到行业谚语，也说明着他们对谚语有比较健全的观念），除了拜访一些老师傅之外，还按行业开了多次座谈会，老师傅们集中在一起，互相启发，互相补充，搜集到的谚语不但数量多而且也更具有准确性，而这不过是他们采取的许多办法中的一种。我们知道，搜集民间文学作品是不能用哪怕有一点点象是强制的办法的，人们只有在一定的情绪状态下才愿意说给你听，唱给你听，才能说得完整、生动，才能唱出他最爱唱的平常不轻易唱的歌。谚语的搜集主要靠平时积累，人们必须在一定的情景下才会想起某一句谚语，加以使用。一般人也不一

定会专心去记住他们能听到的谚语，但也有不少谚语给人们留下较深的印象，几乎每个人都能记住若干句他认为有意思的谚语，湘潭同志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主要采取发动更多热心赞助的人来“凑”的办法，得到丰硕的收获。我以为，这也不单止是个方法，而是因为对谚语的正确观念：相信谚语是无限丰富的，是贮藏在许许多多人的记忆里的，因而也是不能采取容易满足的“差不多就是这样了”的态度的结果。

从“分卷”上看得出湘潭的同志们是重视工作的科学性的，是认真的，严肃的。对资料的取舍和分类都体现出相当高的学术水平，特别是，就整体看，通过编选把谚语的价值和意义比较鲜明地显示出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次，全国都在进行的“民间文学集成”编选工作，第一批三种中收入“谚语卷”，重视谚语，这是完全正确的，对我国谚语研究的开展，谚语学的建立，是会有决定性的影响的。那种认为谚语是“小道”，只以“聊备一格”对待它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分卷”对谚语作了较全面的显示，这应该是符合“集成”的旨趣的。研究对象太丰富了，于是只取所需而丢掉一部分或大部分，这不是科学方法，不能割裂研究对象，更不应该为了让对象适宜于作我的论点的例证而割裂它，幸而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还不多见。如果说编选工作也就是一种研究工作，或研究工作的一个阶段，一个层次，那么，湘潭市谚语分卷所运用的就是科学的方法了。这种全面性使我们对谚语有较完整的认识，这是十分重要的。从这里，我们认识到谚语在民间文化中所占的地位，认识到它是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不是“小道”，而是民族文化心脏上的一条血管，它应该受到重视，应该有更多的人来搜集它，整理它，

研究它。这更多的人中，应该包括文化史家，民族学家，文学史家，以及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史家，农学家等等。我想，这也应该是编纂民间文学集成这一宏伟工作的重要意义所在。

谚语和一切意识形态的产物一样，是思考的产物。由于谚语产生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生活状态，它的深刻性和概括力，各不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别，但即使是一般所认为的极平凡琐碎的“生活经验”，也是思考的产物。而且也并不就是低层次的思考，不能因为它往往带着感性认识的印记，而且几乎总是采取生动的直观的方式，就认为它并不是理性认识的产物，认为它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诚然，谚语总是直接从事物的存在条件、状态、运动中揭示事物的本质，通常用描述感觉、知觉、表象这些方式来表达思维的结果，感觉、知觉和表象都是客观对象的感性形象在人的头脑中的再现，作为社会人的人的头脑（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对客观对象的再现不能不伴随社会性的情绪、感情、意向、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谚语是最短小，最精练的民间文学作品，谚语形象已经不是一般表象而是典型化了的，美化了的，加入了想象成分的。不这样，它就不是谚语，而是格言或口诀之类。所以，我们是不能因此怀疑它的哲学上的价值。何况，理性认识的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也是谚语的创作者们所经常运用的，只是并不“直接地”运用它，而往往能够用诸如分辨真象与假象的方式，选择主要与次要的方式，生动地表达出它的认识结论。达到了认识从自在的现实观念到自为的价值观念的飞跃，没有较强有力的文化意识，是不可能达到这种飞跃的。因之，我们说谚语是文化现象中

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有的同志对此持保留态度，认为谚语的哲学内容是未成体系的，从低级思维阶段到高级思维阶段并陈，给人以混乱之感。然而，难道不正因为这样，需要我們更加认真、严肃地对它进行研究，使谚语的真正价值能够为更多人所知道的吗？

总之，重要的还是我们对谚语（以及所有门类的民间文学作品）要有一个新的观念。读了这部“分卷”后，在这一点上我的认识是更明确了。我们常说要尊重人民智慧，才能热爱民间文学，但在具体工作上，在具体问题上，在某种情况下，却很可能还有保留。即使只是那么一点点保留吧，我相信也是很危险的。可以说，不承认人民智慧，全部人类文明史都可以不承认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曾说过人的生产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人的生产活动不同于动物的觅食、营巢，仅仅出于本能。是有意识的，从自在到自为的，人不是被动地去适应自然，而是利用自然，进而主动地改造自然。因此，人逐步地使自己脱离自然人的地位，而成为“作为人的人”。人与作为动物的人（自然人）不同的是“不仅是五种感官，而且还有所谓精神的感官，即实践的感官，例如意志和爱情之类”，总之，“人性的感官，各种感官的人性，都凭相当的对象，凭人化的自然，才能形成”，这是“从古到今的全部世界史的工作成果”。（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民间文学的作者们，创造着人类文明史，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对认识现实发展的必然，对掌握客观规律的要求促进了生产者们的精神活动，谚语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众多精神产

品中的一种，它是经过无数次实践检验而具有指导性、规定性、权威性的或许可以说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艺术语言，其中的一大部分已不能不列入更高层次的文化现象，忽视它，文化史就将是残缺不全的。

一部完整的谚语选是可以当作社会史读的。这部“分卷”虽然还只能说接近于完整，给我们提供的社会史知识已够丰富了。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潜在势力至今还在妨碍着我们民族的现代化，反封建至今仍然是我们为实现四化而进行的斗争的主要内容。从许多谚语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被马克思称为“精神的动物世界”、“被分裂的人类世界”的封建社会里，创造文明的生产者们是怎样地在奋力抗争，反对那个要使人类已达到的文明（包括已经是文明人的生产者）为自己的吃人事业服役的旧制度、旧观念。为了奴役人民，封建统治者甚至不惜牺牲文明的进步而使文明倒退。不少谚语由于有着极为感人的反叛意识而具有英雄史诗般的悲壮的美（虽然只有一两句话！）它们无疑地是民间文学中的珍宝。

尊重普通生产者的智慧是我们必须保持的最根本的观念。谚语是艺术语言，从语言艺术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其结果很可能使传统的修辞学和语法学不得不作一番更新。在生活中发现美，在语言中发现美，进而创造美，谚语的作者们（普通生产者们）具有这种能力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当然会在认识丑的同时认识美，在揭发假的时候赞美真，而创造美正是为了肯定善，否定恶。他们往往能够在日常生活微不足道的小事里总结出似乎也微不足道的规律性的认识成果。他们是用郑重的态度，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真、善、美的向往而创作、传播和运用这些谚语

的。我们的文明里如果没有谚语，和普通生产者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整个人类文化将建筑在什么基础上呢？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谚语和现实生活的结合是如此密切，不同于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它的欣赏价值和认识价值是和它的实用性密切相连的。它也不是成语、套语之类的简单的语言资料，使用它不止是为了加强语气或使语言生动、有吸引力，它具有明显的教诲意义，它的影响力如此巨大，致使社会上的各种势力都在通过各种方式侵入谚语这个领域，这使谚语的丰富性复杂化了，辨别谚语中混杂的部分成为整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湘潭市的这部“分卷”，对搜集到的全部资料作了严格的鉴别，剔除了那些类似谚语而并不具有谚语素质和特性的废品。即使是一个地市的分卷，还不是省和全国最后编定的选本，这样作是完全必要的。当然，这也是由于他们有着对谚语的正确观念的缘故。

我读到的“分卷”不多，仅从湘潭市这本“分卷”我已经得到了这么多难得的有益的启示了，难以压抑我的喜悦心情，不觉写下了这么些读后感，很希望得到湘潭的同志们、所有热爱民间文学的同志们的指正。向陈旸同志、湘潭的同志们和所有参加“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同志表示一个读者的由衷的感谢。

1988年1月11日于长沙

富有特色的湘潭谚语

序

中国谚语集成副主编 陶 阳

我读了这本湘潭谚语，受益匪浅。这是一本很好的谚语书。

谚语是口头文学中的简短明了的艺术形式，是一种具有知识性、经验性、劝戒性、哲理性的微型口头语言作品。而湘潭的这本谚语真象口传教科书一样，传授了许多有关人类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经验、知识、道德与哲理。例如：

“高山起自一堆土，大海全凭纳细流”，“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不怕月影斜”，这岂不是哲理小诗？它教人胸怀开阔、立场坚定。“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此经验之结晶，极为宝贵，这就提醒人们要警惕反复无常的小人。有道是：“君子当权积福，小人仗势欺人”，“小人得宠，天下必乱”。小人乱世，这是人民千百年来 的经验之谈。但是，谚语也教导人们：“有理不怕势来压，人正不怕影子斜”，“一正压百邪”，教人要做一个堂堂的正派人。民间谚语的内容涉及的面极广，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自然法规，社会风情，无所不包。说谚语是生活的小百科全书，

并非过誉。

这本书的优点很多，主要的有下列几点：

（一）丰富多样，比较全面。除别的县、市有的种类都有之外，还有关于艺术方面的谚语，如关于书画、唱山歌、戏曲等方面的谚语，很有特色。此外，还有关于“棋艺”、“武术”、“僧、道、方术”等等方面的谚语，是独有的。这说明编选同志考虑的周到，谚语的面选的比较广阔。

（二）凡外地人费解的谚语或本地的特殊用语，都加了详细注解。加注，既能令人读懂，同时还有研究价值。这也是科学性的表现之一。

（三）选了许多优秀的谚语，它们既是在人民中间长期口头流传的真正的谚语，又是内容深刻的哲理性很强的谚语，如“灯盏不亮有人拨，事情不平有人说”，“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好比河决堤”等，还有我开头举的一些，都是优秀谚语的例子，因各类都有精采的谚语，不胜枚举。

总之，这本书成绩很大，编辑同志们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细致的工作作风，我甚为钦佩。看来谚语只是些单句和复句，比较简单，但实际上每一则都是一个独立的作品，特别是它还涉及到与其近邻俗语（狭义的）、成语、格言、歇后语等的区别问题。选起来很是吃力，我粗读还读了几天，可见编辑们下的功夫了。正因为编辑同志们下了功夫，使得这本谚语书获得了基本的成功。

由于谚语是复杂的口头语言作品，特别是它与其近邻俗语（狭义）、成语、格言、歇后语，既有区别又有交叉现象，不容易掌握，难免在初选时也选了些不是谚语的东西。我相信编辑同志们在精选定稿时，这一问题会得到解决。

这个谚语集所选的新谚语和乡土谚，较有特色。我想对这两类谚语谈些看法。

关于新谚语的问题。谚语，如同民间文学的其他形式特别是歌谣和民间故事（包括笑话）一样不断有新作品产生与流传。这是口头文学的发展规律，虽然在现代化的新时代总的趋势是口头文学愈来愈少了，但它却决不会象某些人说的就要灭亡了。由于当前人民文化生活的领域愈来愈广，如电视的普及等等，口头文学在人民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口头文学却不会灭亡，只要有人类的语言存在，口头文学就会不断产生。尤其是一些短小的口头文学形式，如时政谣、谚语、歇后语等，更会不断地产生。

这本书注意选了新谚语，是个优点。比如：

“增产好比摇钱树，节约好比聚宝盆”。

“效率是水平，质量是生命”。

“自检互检专人检，产品质量才保险”。

这些已具备了谚语的特点，说它们是新谚语，说得过去。

然而，选新谚语，应当采取慎重态度，或者说抱着科学态度进行鉴别，方可成立，否则，为新而新，反倒毁坏了新谚语的名声。在选新谚语的时候，注意不要把常用的生产用语和标语口号选进去。例如：“计划就是法律”、“人人有岗位，个个有专责”，“劳动有定额，质量有要求”。这些都不能算是新谚语，选新谚语宜严不宜宽，要选那些真正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新谚语，切忌与标语口号及生产日常用语混同。

关于风土谚问题。这本书注意选了风土谚，例如“乡情”、“地理”、“特产”、“乡俗”，这是很好的，对我有启发。过去我对风土谣谚的看法是怕将属歌谣范围的乡土谣收进来，所以在我的讲话中没有强调选乡土谚。现在我的看法有了转变，只要把风土谣与风土谚大体区分开来，各县、市资料本都注意搜集和编选本地区的风土谚（或称乡土谚）还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增加些地方的特色，每个县、市都重视乡土谚，那么集中在省卷的谚语，也就会有特色了。要立足于本地区，显示自己的特色方为上乘，而注意搜集和编选乡土谚，则是增加特色的一个方面。此外，就全局而言，只有下工夫搜集本地区群众口头上流传的谚语，才能使每个省、市、自治区的谚语集更富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同时也可力求避免相互重复的现象。

但愿湘潭这本谚语书能对其它县、市的谚语的编选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1988年2月21日于北京